



傅熹年

Fu Xinian

傅熹年

建筑历史学专家。1933年1月2日出生于北京,原籍四川省江安县。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研究员。五六十年代先后为梁思成、刘敦桢教授助手,进行中国近代和古代建筑史研究。以后重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和宫殿坛庙等大建筑群的规划、设计手法及建筑的设计规律,揭示出中国古代城市以宫城、里坊为模数,大建筑群以主院落为模数,单体建筑以所用材和柱高为模数等一系列模数规律和建筑比例的设计方法。发现宫殿坛庙等大型建筑群在规划时用标准方格网控制尺度和相互关系,并把主体建筑置于建筑群几何中心的手法。利用已掌握的模数规律,对西周、战国、唐、宋、金、元一系列建筑遗迹做复原研究。发表论文近30篇,出版《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1994年完成《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史》的撰写,2000年撰成《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专著,均已出版。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祖籍四川江安,1933年1月出生在北京一个有深厚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家庭,从小就受到这方面熏陶。上高中时,在《新观察》和《文物参考资料》上读到梁思成先生介绍中国古代建筑和北京城的文章,十分倾慕,认为这是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结合点,遂有志于此,于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营建系。

1956年3月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土

木建筑研究所工作。同年9月被派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与土木建筑研究所合办的、由梁思成先生领导的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工作,实现了研究中国建筑的夙愿。1957年春被派为梁思成先生助手,协助梁先生进行《北京近百年建筑史》专题的研究工作。这样,就有机会登门向梁先生汇报工作,直接得到他的教诲和指导。梁先生的亲自示范、细心指导、严格要求,给我以极大的教益,终身难忘。

1958年初,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撤销,人员转入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室。但我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被划为右派,遂自1959年春起在建工部农场劳动,1960年秋摘帽后回建筑历史研究室工作。在劳动期间我设法通读了《资治通鉴》和《营造法式》,对古代史和古代建筑有了初步的概念。

1961年开始参加“浙江民居”的调查研究工作。当时的方针是从设计角度去总结浙江民居的特点和优点,以写生钢笔画和实测图的方式表达。浙江民居组的十余人辗转于山区水乡,画了数百幅表现民居设计手法的写生画和实测图,随后编成在当时颇有新意的专著《浙江民居》。1963年下半年起又用同样方法开展了福建民居的调查。通过参加民居的调查,我对民间建筑文化传统有了深刻的认识,而大量写生也提高了我的建筑绘画和制图水平。我平生最佩服梁先生的铅笔速写,按他的方法和风格实地练习作民居和古建筑写生,使我受益匪浅。

自1963年上半年起,我参加了刘敦桢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工作,主要任务是制图、核查资料和编写注释。因近年发现建筑遗址颇多,刘敦桢先生要求我做一点遗址复原研究供参考,遂先后做了唐大明宫含元殿、玄武门等的复原研究,绘成复原图,得到刘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也开启了我对复原研究的兴趣。我还向刘先生请教《营造法式》问题,竟蒙刘先生慨然允许把他自己的手校故宫本和手批本让我转录,为我以后研究《营造法式》打下基础。在

刘敦桢先生身边工作,刘先生对建筑发展的精辟见解、深厚广博的文献研究、对学生循循善诱的指导、严格而具体的要求,使我对建筑史研究的方法、途径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有了一点点信心。

1965 年开展“四清运动”,建研院被迫撤销了“宣扬封、资、修黑货”的建筑历史研究室,大部分人员分配外地。幸运的是,两位主任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虽无力阻止,但提出希望有几个人最好能保留其专业,其中竟有我的名字,因此我得以暂时留下。

“文革”中我做了三年水暖工。1970 年分配到甘肃天水的建筑公司工作后,工余研读《营造法式》,也会偶有收获,如对殿堂型构架可分解为上中下三层、厅堂型构架由若干道构架横向拼合成、应县木塔构架分层等的研究和分析图等都是这时完成的。

1972 年夏,我被借调回北京参加筹备出国文物展览的画图工作,得到一次难得的重拾旧业的机会。除画图外,还根据考古实测图对北京元代建筑遗址和唐含元殿遗址等绘制了复原图供国外展出之用,以后撰成论文在《文物》上发表。

1972 年以来,建委建筑科学研究院开始恢复建筑史研究。当时室内诸公都有意要我回来工作,但因我的“摘帽右派”身份,在当时形势下不能如愿。到 1975 年初搞“评法批儒”,在向谷牧同志汇报情况时,建筑科学研究院袁镜身院长和与会诸公趁机向谷牧同志提出,竟得到批准,我才得以于 1975 年 3 月重回建研院参加建筑史研究工作。历史室主任刘祥桢在“四清”时即因“重用右派”受到批判,袁镜身院长和我此前从未谋面,却肯向谷牧同志提出,说明他们为了开展工作,竟甘冒一定政治风险。这给我极大震动,使我感到必须加倍努力工作,力争做出成果,才能不辜负这些老前辈、老领导的一番心意,这成为以后经常督促我工作的重要动力之一。

重返历史室后,我在参加编写大百科全书建筑卷的同时,也做了一些具体研究,如通过对岩山寺金代壁画的研究考证了宋元宫殿的特点;在调研了福建、浙江、江苏的宋元遗例后,发现日本“大佛样”、“禅宗样”建筑源于宋元时福建、江苏、浙江的地方式样;根据元代文献中的数据对元大都的宫殿进行了复原研究;在考察日本古建筑后发现很多方面反映了我国南北朝隋唐建筑特点,可以补我国建筑史料之不足,这些都陆续撰文发表。

1988 年开始承担五卷本《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三国至五代建筑史的编写工作,同时也开始更多地考虑建筑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和自己的努力方向。我觉得应开始从更广的、综合性的方面进行探索,遂选择了形成中国古代建筑突出特点的单体建筑设计、群组布局和城市规划等问题进行研究,但这只能从有精确图纸和数据的实例开始,研究范围受到一定限制。

我利用北京市 1/500 实测图进行探索。首先发现北京城东西宽为紫禁城宽的 9 倍,南北深为其 5.5 倍;再以紫禁城面积在北京城图上画网格,发现与若干纵横干道重合或相近;这表明宫城面积与都城间有模数关系。

在利用《北京中轴线建筑实测图》对北京的宫殿坛庙大建筑群进行探索时,发现紫禁城内各主要宫院均以内廷主建筑群“后两宫”的面积为模数、天坛在始建时以大祀殿下的土台之宽 50 丈为面积模数等共同特点,表明在有特殊意义的重要大建筑群布局中,往往以主建筑群为面积模数。同时,还发现这些建筑群组都是以一定尺度的模数网格为基准进行布置的,如紫禁城内大、中、小建筑群组和太庙、社稷坛等分别用方 10 丈、5 丈、3 丈网格为布置基准。在对大型建筑群组布局的探索中又发现了把主体建筑置于地盘几何中心的布置特点。

这样,利用较准确的、附有数据的实测图,发现了明清时在都城规划和大型建筑布局方面的一些通用的手法和规律。

在单体建筑设计方面,通过对大量实测图的分析发现,在剖面设计上,宋代以前,进深四椽建筑的脊高为下檐柱高的2倍;元代以后发展为进深六椽建筑的脊高为下檐柱高的2倍;现存绝大部分建筑都符合或接近这个比例关系。在用作图法对立面进行分析时,又发现通面阔基本是下檐柱高的倍数。综合这两种现象可知,下檐柱高在剖面、立面设计上起关键作用,是它的扩大模数,这有助于保持各建筑间的谐调,也可简化设计。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2000年完成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专题研究,证明至迟自南北朝起,我国就形成一套不断发展完善的用模数和模数网格控制规划、布局和设计的方法,可保持城市、建筑群、建筑物的统一谐调并对共同风格特征的形成、延续与发展起重要作用,在当时有较高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先进性。但这只是就现有材料所做的初步的探索,还需要扩大范围,在更精密的测图、更完整的数据的基础上做分项研究,进一步深入、广泛地探索其方法和规律。

通过这些工作,又使我逐步看到古代规划和建筑上的这些特点与规律的形成除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外,也和古代哲学思想、伦理观念、礼法制度、文化传统、艺术风尚、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人文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如都城以宫城面积为模数,皇宫内大小宫院以皇帝的寝宫面积为模数等特点体现了皇权涵盖一切;各建筑群组均使主建筑居地盘中心,则体现了“以我为中心”;对很多群组布局形式、建筑形式、建筑装饰和色彩的使用加以严格的限制,体现了社会上森严的等级制度。这些都表明社会人文因素与中国古代建筑基本特点的形成有极重要的关系,应该探讨它们如何影响中国古人的建筑观(拓展开来则是人居环境观),以及形成建筑审美趣味并进而影响和控制古代建筑的发展进程。这项工作将使我们对影响古代建筑发展的因素有更为全面的认识,进一步了解我国独特

的建筑体系得以形成和长期延续的原因,把我们对古代建筑发展的认识提到理论高度。我曾计划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可能是因为题目中有“社会人文因素”字样,有关方面“不予支持”,只能暂时搁置,等待机会。自2003年开始,我接受了卢嘉锡先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建筑卷的撰写任务,历时三年,于2007年完成,全文53万字,近700幅图,是一部侧重于建筑技术的古代建筑通史。

回顾五十年的工作经历,我感到在“文革”前,研究建筑历史实近于一种“高危行业”,随时可以由“总结历史遗产”变成“宣扬封资修黑货”,我所画的民居图就曾被指责为“为地主画变天账”,还有过两次解散研究室的经历。但我并不后悔,因为通过深入的接触,我深刻认识到我国的建筑历史遗产是优秀的、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体现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先民的奋斗历程,只要我们努力工作,正确阐扬,它终将得到正确的评价,并成为人类共同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在改革开放以后已成为现实,我以能从事这方面工作为荣。但我同时也深感建筑历史是一门广博高深的学科,分支众多,需要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我自己能力有限,能在这一领域做一点工作,很重要的是机遇。机遇之一是有幸能直接在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指导下工作过一段时间,在做学问的门径和方法上得到指导,在严格、严肃的学风上看到典范,立志要继承他们的工作。其二是能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受到各级领导的破格关怀,得到极为难得的研究建筑历史的机会。除了对这一专业本身的热爱外,这两点是我发奋不懈、努力工作的重要动力之一。现在我虽年逾古稀,仍要不忘师长的教诲引导、老领导的关怀鼓励,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在梁思成、刘敦桢二位老师开拓的道路上继续奋进,在总结和阐扬古代优秀建筑传统方面力争多做些工作。

除了研究建筑历史外,我业余也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研究。首先,出于对家庭的责

任,我整理出版了祖父关于古籍版本目录学的遗著 4 种,又整理出版了父亲关于古代玉雕艺术的著作二种。此外,由于我本人对中国古代书画的兴趣,并曾参加全国书画鉴定组的工作,在古代绘画史方面也进行了一些研究,论文编为《傅熹年书画鉴定集》出版。积以时日,我本人业余对古籍版本目录学、古代玉雕艺术和中国古代书画等方面都进行过有一定深度的研究,近于形成了第二专业,因此,自 1982 年起先

后被聘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图书馆顾问。2005 年起又被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于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在基本特点、历史背景、发展进程乃至研究方法上都有某些可以互通之处,这些业余的研究对建筑史研究也有一定助益和启发的作用。但我仍坚持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主业,令其他方面处于业余和次要的地位。